

晚霞滿天垂青史

一、面對極「左」思潮之憂

巨星在隕落時，常常會劃破長空，大放光芒，呈現壯觀的流星圖像。這是它在進入大氣層時受到摩擦而產生的光和熱。

宋慶齡的晚年，既遭十年浩劫的磨難，又逢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盛世，她與全國人民同憂患，共鬥爭，齊歡樂，也是晚霞滿天，大放光彩。

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發表的《回憶孫中山》一文中曾經說過：「偉大的人民力量，已推動了歷史的車輪，通過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兩個階段，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一變而為獨立自由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成爲一個強盛的國家……不僅把孫中山奮鬥一生的理想變成現實，而且遠遠地超過了他的理想。」¹⁰⁶不過，宋慶齡對於有些事情已經開始困惑了。

早在一九五三年，中國共產黨公布過渡時期總路線，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隨後提前終止新民主主義階段的路線和政策，將私營企業經過公私合營收歸國有。原說的中國應使私人資本主義有一個較大發展的諾言被提早收回。同時，內部通知：「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由蘇聯搬來計劃經濟體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體制，由於脫離當時我國生產力發展水準，脫離人民的意願和生活需要，造成了許多社會問題，雖然有不少人對此有懷疑、有異議，但沒有勇氣和信心說出。宋慶齡則就新中國成立後一些「左」的錯誤政策提出意見。她不避「要代表資產階級說話」和「民主革命時期同路人」的嫌疑，於一九五五年一月直言不諱地專門致函毛澤東，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向其質疑「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她在信中表示：「我們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障工商業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要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抱怨。」¹⁰⁷這一意見，反映出宋慶齡獨立冷靜的見解和實事求是的精神。遺憾的是，她的意見沒有得到中共最高領導人的重視和採納，極「左」的政策和做法反而有增無減。

到了一九五六年以後，越來越嚴重的「左」的干擾，使中國出現了十分複雜的局面。國內外、黨內外，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織在一起，給尚未具有成熟豐富治國經驗的國家

領導人提出一系列難題，也使他們的工作出現了一偏差。這偏差，反過來更加推動了「左」的傾向的蔓延。

按照宋慶齡具有的知識結構、豐富經驗和政治敏感，本是可以對以後歲月中國家政策上長時期的「左」傾錯誤，發現許多問題，提出寶貴意見；而且，以她的地位和聲望，也一定會產生相當的影響。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至少並非完全如此。

由於對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在民主革命時期及解放初期取得傑出成就的崇敬和信任，再加上非共產黨員的微妙處境，逐漸步入晚年、疾病纏身的宋慶齡深入基層和聯繫群眾的機會日益減少。她身上那些在民主革命時期曾經發揮特殊作用的素質，在新的歷史階段未能繼續展現光芒。不能否認，在建國後長期「寧左勿右」的空氣的薰陶下，宋慶齡與許多幹部一樣，對於右的、落後的事物比較敏感，但對於「左」的錯誤傾向則常常不能識別，甚至出於善良的願望加以附和；有時雖然有所察覺，有所抵制，但不見成效；有時則抵制不力或無力抵制，處於一種無可奈何的境地。上述情況在進入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更加明顯。

宋慶齡對整風運動向「反右派鬥爭」的轉向和擴大化的做法，持保留態度也是無奈的。她也只有同親近的朋友交談時才隱隱表示出不安。在給李雲的信中，她就曾流露出這種情緒。李雲回憶說，得知她有反對的情緒後，周恩來曾親自向她了解釋，她接受了。出於對黨的擁護和熱愛，宋慶齡在公開場合還是附和了這場運動。她一方面維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少數人企圖利用「整風運動」，「來使我們的新的政治制度和我們的國

家基礎發生動搖」，表示：「我們必須克服溫情主義，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右派。」¹⁰⁸ 只是後來看到運動的發展超越了原來規定的範圍並發生轉向時，宋慶齡才對李雲透露：她對於正在發生的事情開始無法理解。

在這場對新中國的歷史產生嚴重而深遠影響的「反右派鬥爭」中，被劃為頭號「右派」之一的章乃器，正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與她一起領導救國會進行艱苦卓絕鬥爭的戰友。面對這種局面，她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去保護幫助他們。宋慶齡的內心是苦楚的。她對「反右」很不理解。

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開始兩個月後，她寫信給中共中央：

「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麼可能一天就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¹⁰⁹

包括章乃器等宋慶齡所熟知的一大批人被打成「右派」之後，「左」的干擾深入到經濟領

108 《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九月十日。

109 尚明軒主編：《宋慶齡年譜長編》下卷，第九百九十二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

域，一些政策和做法違背客觀規律，表現為急於求成，誇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集中表現為希望「在一個早晨進入共產主義」，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

從能看到的有限文字資料分析，宋慶齡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可以說表面上還是贊成的。她為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沖天幹勁和共產主義勞動態度」所感動，這是毛澤東發出的號召，而在她看來，歷史已經證明，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許多關鍵問題上的決策都是正確的。在當時視察上海國棉十七廠和「七一」人民公社時，宋慶齡就說過：「他們的勞動熱情和共產主義道德品質、他們的智慧和創造精神深深感動了我」、「我學到了很多東西，真可以說是『勝讀十年書』」。她甚至為此歡呼：「這是一個生產力大解放的時代，一個思想大解放的時代，一個人和人的關係、人們的精神面貌起著深刻變化的時代，一個出奇跡的時代。」；「我們處在這樣一個光輝的時代，我們有這樣光輝的人民，讓我們用最美的聲音歌頌我們的人民吧，



一九五八年十月，宋慶齡視察農民公社時和農民在一起。

讓我們推動這個時代向著更加光輝燦爛的明天飛馳前進吧！」¹¹⁰ 她對運動中嚴重氾濫的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等「左」的錯誤，開始的時候，也和許多人一樣，不能識別，不能抵制，而且還付諸行動予以支持。在大煉鋼鐵的熱潮中，她曾與秘書、花匠、廚師、管理員和身邊其他工作人員共同七人，在上海住宅的後花園裡用磚壘了一座煉鋼爐，進行土法煉鋼，甚至還親自在爐前參加勞動。不過，當浮誇風刮到她所熟悉的領域時，她開始進行了一些抵制。如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她審讀了一篇準備發表在《中國建設》雜誌上的關於中國福利事業的文章後，就給編輯部寫信提出了意見：「文章讀後給我的印象是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但我認為，我們必須說，在福利方面，我們要做的事還很多，因為我們還處在建設一個新社會和一個新經濟基礎的過程中。這個情況應該講得更明確些……雖然我們有了很大進展，但目前還不能滿足我們所需要的一切。」作為一名不是共產黨黨員的國家領導人，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宋慶齡能實事求是地寫出這樣的話，頗屬不易。

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運動接踵而來。在那場運動中，宋慶齡再次對李雲表示，她無法理解對彭德懷元帥的處理。彭德懷從紅軍時代起就是一位出色的指揮員，而且在建國後還率領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取得了重大勝利，為國家和民族爭得了榮譽。可是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他卻被撤銷了領導職務，而他唯一的「罪狀」就是揭示了「大躍進」和人民公

110 (美) 斯賓塞：《三姐妹——中國宋氏家族的故事》第一百七十九頁，紐約一九三九年英文版；高明軒主編：《宋慶齡年譜長編》（一九九三——一九四八），第九十八頁，北京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社運動的消極面以及黨的主要領導人工作中的失誤。

不過，總的來說，宋慶齡還是對新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前所取得的成就予以了高度評價。在談到這一點的時候，她表現出來的是別樣一種心情。

面對三年自然災害和生活困難，全國人民已經不再熱衷於那些令人不快的政治運動，大家一起決心在的領導下齊心協力渡過難關。自一九六二年起，面對國民經濟的恢復和難關過後的新景象，人們又開始憧憬一個美好的未來。那些陰暗的東西暫時較少被提起。在這種情況下，宋慶齡的心情也好了許多。正是基於這樣的形勢，她才寫出了《大無畏的中國人民》和《解放十六年》兩篇總結性的文章。

前者寫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後者寫於一九六五年底。文章熱情讚頌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革命、建設、外交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並說明了取得這些成就的原因和經驗。

文章的基調是歡快的，從中可明顯感覺到宋慶齡此時對新中國的成就表現出的熱情，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未來，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指引的道路流露出的必勝信心。

她沒有想到，此後國家政治形勢的發展，已經大大超出了她的估計。如果說，在以老革命和老盟友為打擊對象的反右派鬥爭和反右傾運動中宋慶齡還能自保的話，進入「文化大革命」階段，情況就遠不再是這樣了。

二、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裡

「文化大革命」中的宋慶齡歷經磨難，備感困惑。她越來越感到迷茫、失望和氣憤，最後選擇了沉默。大體說來，她從疑惑、覺察、警悟、認識幾個階段，逐步發展到抵制、回擊、揭批和反思。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她憑著良知，做到了她所能做的一切。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相比，她少了一些消極，多了一份主動；少了一些自我壓抑，多了一份率直。不過，她的內心在相當長的時期處於極其矛盾的狀態中。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撥亂反正後，她才從這種複雜心態中慢慢解脫出來。再次以一種全新的精神面貌，同全國人民一起歡欣地迎接新的時代。

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初，宋慶齡也和所有善良的人們一樣，既無思想準備，又感到困惑不解。作為新中國的領導人之一，她堅信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正確性。毛澤東在她心中，一直有著極為崇高的地位。她對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這場以「反修防修」、防止資產階級的「和平演變」、保證新中國沿著社會主義的正確軌道前進的「革命」宏偉目標深信不疑，並且力圖使自己跟上運動的步伐。

「她像每一個善良的人一樣對這場『大革命』存有幻想，還滿腔熱情地買了一些『紅寶書』分送給周圍的工作人員。」可是，後來事態的發展，越來越令她失望，甚至氣憤。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和一大批革命老幹部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打倒在地，同她共事多年的摯友（如金仲華等）也被迫害致死，孫中山先生的舊部屬成了「封建餘孽」被開除被批鬥，全國陷入

一片混亂……面對這一切扭曲的現實，她憂心日重，寢食難安。

這時的宋慶齡已七十多歲高齡，牆外大喇叭中不停喊叫「打倒走資派」的雜訊，打破了她北京後海北沿四十六號寓所的寧靜。她在上海的住宅，也被紅衛兵闖入擾亂。儘管如此，她還是和當時許許多多善良的人們一樣力圖適應新的形勢，以一種積極的姿態對待群眾運動。按照宋慶齡的理解，只有「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才能確保她畢生為之獻身的革命事業永不變色。她甚至還要求自己通過運動來改進工作。宋慶齡在給老同事、老朋友羅叔章的信中說：「請你把紅衛兵對我的大字報借給我看……上次你借我看的，沒有包括在內。我怕我不開心是麼？我看到對我的批評不會主觀。如果我有不對的地方我要知道，以便改掉不好的作風。如果不知，那怎麼改呢？」信中還特意叮囑羅：「此信看後即燒掉為荷！」¹¹¹她有時還坐著汽車，上街去看大字報，瞭解情況。她還寫信給當時正在接受批判的中國福利會秘書長李雲，囑咐她「趕快檢查工作，作自我批評」。這說明，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階段，在不瞭解情況、更沒有思想準備的狀態下，宋慶齡還是從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出發，以正確對待群眾運動的態度，身體力行，希望通過這場運動，「在新的秩序下回到建設的道路上來」，並且期望在運動中通過自我批評改進工作，使革命隊伍思想更一致，更團結，更有成效地建設社會主義祖國。

宋慶齡的這一美好願望，更集中體現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她寫給美國友人格雷斯·格蘭尼奇的一封信中：「你一定看到了所有關於這裡發生的變化的報導——一次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運動正進行，它將確保修正主義的魔影不論現在還是今後都不可能出現。」¹¹²

最初的階段，「文化大革命」的本質還沒有充分展開和暴露。

很快，形勢就急轉直下。洶湧澎湃的紅衛兵運動打亂了整個社會秩序，並逐漸被林彪、江青一夥野心家所利用和操縱。他們以革命的面目出現，用極其卑劣的手段，企圖打倒一大批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打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恣意歪曲篡改歷史，為他們篡黨奪權做準備。在那血雨腥風的日子裡，冤假錯案遍及全國，很快，許多曾與宋慶齡長期並肩戰鬥的同志和戰友都紛紛「靠邊站」，先後被冠以「叛徒」、「反黨分子」、「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等各種罪名，進而受到批鬥、關押、遭到非人的摧殘，有的甚至因不堪忍受屈辱和迫害而死。國家主席劉少奇被誣衊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少長期支援中國革命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宋慶齡的親密朋友愛潑斯坦等，因莫須有的罪名而身陷囹圄。最令宋慶齡不能容忍的是，她的導師、戰友和伴侶孫中山先生，也被江青一夥別有用心地誣衊為「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老祖宗」，他的部屬被誣為「封建餘孽」，他們竟然聲稱還要取走國慶日時豎立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孫中山巨像。宋慶齡本人受到的打擊

112 王偉：《姐妹情深同胞殘餘——宋慶齡和宋美齡》，載《宋慶齡與中國名人》第三百九十七、三百九十八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也逐步升級。她主持的中國福利會的工作受到極大干擾而幾乎陷於停頓。正如她一九七八年為紀念中國福利會成立四十周年而作的文章中陳述的那樣：「四人幫」的破壞和干擾，「造成了我們各項工作的不同程度的損失。」¹¹³十年動亂開始以後，中國福利會在上海的工作實際上處於停頓狀態：《兒童時代》雜誌不再出版了，宋慶齡也接不到一份中國福利會下屬的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兒童藝術劇院和其他單位的報告了，這些單位的領導，當時正處在不斷加強的政治高壓之下。

終於，理性的堤岸被狂潮衝破，運動的鋒芒也像洪水猛獸一般向宋慶齡本人撲來。紅衛兵們以「出身於剝削階級」、「妹妹宋美齡是蔣介石的妻子」等荒謬理由為藉口，企圖衝擊她的住宅；在南京，孫中山的銅像被紅衛兵移走，並準備砸毀；在上海，宋慶齡父母的墳墓被郊區「造反有理」的農民挖掘夷平。

先她受到衝擊的是中國現代史上飽受爭議、集多種角色於一身的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釗。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夜，一幫紅衛兵查抄了他的住宅。第二天凌晨，老先生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了這一情況。毛澤東當即作出批示：「宋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周恩來責令有關人員立即送回抄走的全部書籍，並派人前往保護章家住宅。他由此想到了其他一些應該予以保護的物件，於是同時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呈報毛澤東主席。在這份名

單上，宋慶齡居於首位。

有的紅衛兵要求撤銷宋慶齡的國家副主席的職務，並揚言要衝進她的寓所。為此，身心憔悴的周恩來總理於九月一日義正詞嚴地告誡北京的紅衛兵：「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孫中山的功績，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後寫的一篇重要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肯定了。他的功績也記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南京的同學一定要毀掉孫中山的銅像，我們決不贊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門對面放孫中山的像是毛主席決定的。孫中山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他有功績，也有缺點。他的夫人自從與我們合作以後，從來沒有向蔣介石低過頭。大革命失敗後她到了外國，營救過我黨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戰爭時期與我們合作，解放戰爭時期也同情我們，她和共產黨的長期合作是始終如一的。我們應當尊重她。她年紀很大了。今年還要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寫文章，在國際上影響很大。到她家裡貼大字報不合適。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一個革命的，不能因為她妹妹是蔣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國家撥給她的。有人說：『我敢說敢闖，就要去。』這是不對的，我們無論如何要勸阻。」¹¹⁴

周恩來建議宋慶齡搬到中南海去住，她婉言謝絕。為了確保她的安全，有關方面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曾派人來告誡她周圍的工作人員：不出去參加運動；不參加群眾造反派；安心

工作，為宋副主席服務好。然而，在「左」傾潮流的鼓動下，仍有部分工作人員違反指示，參加了造反派，對宋慶齡的服務也不再盡心盡力。這些人稱她是「資產階級」，宋慶齡聽後鬱結於胸，以致胃部疼痛不已。她的老秘書黎沛華和新來的秘書劉一庸也因出身不好受到造反派的斥責，不敢再陪宋慶齡共進午餐，不久便都回了上海。宋慶齡寓所裡鋪設地毯也被說成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只好卷了起來；院內的「暢襟齋」、「聽鸞軒」等許多匾額被當作「四舊」摘掉；室內掛起了毛主席語錄和標語。有的服務員進進出出板著臉，看見她也不予理睬。在這種情況下，宋慶齡決定不再從二樓臥室到樓下餐廳用餐。她將情況報知周恩來總理，周恩來立即指示，調走了宋慶齡身邊參加造反派的警衛秘書，另為她增派了警衛，崗哨一直布置到德勝門和甘水橋附近。宋慶齡從浙江大學調張珏來京擔任自己的工作秘書。一九六八年五月，她的警衛秘書由杜述周接替。¹¹⁵正是周恩來採取的這些及時補救措施，最終使宋慶齡在「十年浩劫」中沒有受到連國家主席也未能倖免的劫難。

即使如此，宋慶齡的精神還是極端苦楚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她在致沈粹鎮的信中就流露出了這樣的心情。她「一方面叮嚀朋友「好好保重身體」，一方面是謹慎地打聽中國福利基金會和中國福利會原英文秘書蔡嫻雲的消息：「我的老幹部，蔡嫻雲，一年多沒有消息了。不知道什麼緣故她被關起來。我日夜不安，不知是否因為她代我交一些錢給我一個

表親的緣故？因為她一直很老實，守紀律的，也不和壞人來往。如果你聽到她的消息，請不要瞞我吧。我要對她負責！除了生在資產階級家庭裡，我的表親從未參加過政治或做過壞事。一直很老老實實的。」¹¹⁶當她得知父母的墳墓被挖掘的消息後，悲痛再也難以抑止。她托廖夢醒通過鄧穎超鄭重地把這個情況告訴了周恩來。周聞訊也非常震驚和氣憤。他頂著巨大的壓力，立即給上海掛去長途電話，迫使當時受「四人幫」兩個骨幹分子張春橋和姚文元直接操縱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和民政局重新修繕了宋氏墓地，重立了墓碑。隨後，鄧穎超又讓廖夢醒把墓地修復後的照片交給宋慶齡看。宋慶齡看著照片，才稍感寬慰地說：「祖宗總算有個地方蹲了。」她對於周恩來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為她所做的這件事，表示無比感激。過去，如果為了自己別的事情，她是不會去驚動日理萬機的周總理的。

宋氏墓地雖然修復了，但那些小人們在這件事上還是做了手腳：新立的墓碑上只留下宋慶齡一個立碑人的名字。對於這種強加於人的荒唐可笑的做法，在當時壓抑的政治氣氛下，宋慶齡的內心有著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粉碎「四人幫」後，宋氏墓地再度重修時，立碑人才重新刻上了宋嘉樹夫婦全部子女——藹齡、慶齡、美齡、子文、子良、子安的名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文革」初期刮起的「破四舊」狂潮，再次衝擊到宋慶齡的身上。一些幼稚的孩子，受別有用心者的挑動，寫信給宋慶齡施加壓力，要她改變保持了幾十年的

髮型。有些大字報指名道姓地叫嚷要剪掉宋慶齡的髮髻，說什麼這是「封、資、修」的象徵。八月的一天，宋慶齡請廖夢醒及其女兒李湄和老朋友魏璐詩來寓所吃晚飯。談及「破四舊」事，她認為紅衛兵對自己的無理要求不能接受，斷然表示：「我不要剪頭髮！」

宋慶齡一直保持自己的髮式。那是對故去母親的一種承諾。

母親倪珪貞在臨終時，曾提出女兒們永遠不剪短髮的希望。她們三姐妹一生都謹遵母親的囑託，始終都梳著髮髻，沒有改變。

宋慶齡對母親的感情是複雜的。一方面，她始終懷著感恩之念；一方面，她又時常懷著歉疚，她與孫中山的婚姻曾給自己的父母造成了感情上的傷害。雖然父母最終接納了她的選擇，承認了這樁本來堅決反對的婚事，但對宋慶齡來說，她卻無法撫平父母受傷的心靈。為了革命和事業，多年來，她未能陪侍在母親身邊盡孝，可是，她對母親的深厚情感卻從未稍減分毫。她將母親的遺像懸掛在自己上海故居的餐廳裡，一日三餐，都可以看到母親慈祥的笑容，好像她們從來就沒有分開。

在瘋狂的「破四舊」和抄家的淫威下，宋慶齡看清了「文革」的本質，一向謹慎周密的她還是採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以防不測。牆上掛著的那些人體畫、工藝品、孫中山畫像，都讓秘書取了下來。她把一部分藝術品送給馬海德，請他把這些東西再轉到路易·艾黎那裡。馬海德後來說，他是親自把這些東西轉送去的。他這樣做也冒著一定的風險，因為他當時也已受到尖銳的口頭攻擊，他的妻子蘇菲被她工作的那家電影製片廠的造反派關了起來。

除此之外，宋慶齡兩次支開身邊工作人員，獨自一人親手燒毀了不少信件和材料。到了晚年，她曾這樣感歎道：「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沒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毀掉了所有的東西，我把它們都送進火爐了！」¹¹⁷

當「文革」開始只過了三、四個月的時間，宋慶齡就對這場「革命」產生了懷疑，感到所發生的許多事情與所宣傳的運動目標相去越來越遠。她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這算什麼革命行動呢？當時陳炯明叛變，我堅決地和他鬥爭，這才算叫革命行動呢！」她這裡說的是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凌晨，粵軍頭目陳炯明舉兵叛變圍攻孫中山廣州總統府的事件。看到劉少奇遭到批判，她不能理解：「對劉少奇這樣的老革命家，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呢？」她鄭重地寫信給中共中央，嚴厲聲明：

「我不懂文化，說小說就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下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們學習批判劉少奇，我不會做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十四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於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¹¹⁸

117 盛永華：《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宋慶齡》，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一百七十九頁。

118 陳鐵健：《她永遠美麗——宋慶齡後半生讀後》，載《文匯讀書週報》二〇一〇年四月二日。

在一九六六年國慶日的天安門城樓，她又讓羅叔章把紅衛兵的傳單拿給她看。不過這次不像以前那樣，為了探究自己需要改進之處，而是為了「瞭解形勢的發展」。這時候，她對動盪的現實更加憂慮，也更為反感。毛澤東曾派江青專程前去向她解釋「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她正告江青：「對紅衛兵的行動應該有所控制。不應傷害無辜。」¹¹⁹聽到宋慶齡的告誡，江青的臉立刻沉了下來。宋慶齡與江青是熟悉的，一九四九年，她與江青第一次見面後印象良好。那一年，她到北京參加開國大典後回上海，毛澤東派江青到車站送行。她後來向旁人談及，江青「有禮貌，討人喜歡」。一九五六年，她在上海宴請印尼總統蘇加諾，江青和劉少奇夫婦出席作陪，她對江青文雅的舉止、得體的服飾都表示了讚賞。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江青就大不一樣了，她的言辭完全是一副教訓人的腔調。權傾一時、紅得發紫的江青也由此對宋慶齡從嫉恨發展為仇恨。

進入十一月，北京炎熱難耐的盛夏過去沒有多久，秋天的寒氣已經逼人。十一月十二日，是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的紀念日。

為了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人民出版社重印了一九五六年出版的、由宋慶齡題寫書名的兩卷本《孫中山選集》，同時還出版了由周恩來題寫書名的一卷本《宋慶齡選集》。當秘書把這兩套書送到江青手上的時候，她看到宋選封面上周恩來的題簽，瘋了似的把書扔到地

板上，並用雙腳踐踏，氣急敗壞地說：「總理真是！還給她題字！」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她更是拒絕參加。

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對宋慶齡來說，卻是一個宣傳孫中山的機會，也是一個打破沉默的機會。她不能不說話了。

宋慶齡一直認為，解放後對孫中山的評價有欠公允，宣傳孫中山的工作也做得很不夠；現在又出於卑鄙的動機或對孫中山革命經歷和革命精神的無知，出現了詆毀孫中山形象的歪風，他們誣蔑孫中山是「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老祖宗」，極力渲染孫中山的「階級劣根」，致使孫中山的尊嚴遭到褻瀆，孫中山的名譽遭到詆毀。在涉及理想、信念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宋慶齡再也無法沉默。革命原則和經驗告訴她，這股歪風不僅僅是在割斷和扭曲歷史，而且是別有用心的。她不得不以七十四歲的高齡，再次奮起，堅決捍衛孫中山的革命旗幟。這是她對逆流第一次有力的回擊。

宋慶齡一反過去在孫中山誕辰或逝世紀念日不會客、不參加紀念活動、獨自一人在房間裡默念的習慣，她以滿腔的熱情，集中最大的精力，經過縝密細緻的思考，撰寫了一生中最長、也是最後一篇紀念孫中山先生的文章——《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她親自出席在首都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萬人大會，在會上宣讀了這篇演講。

宋慶齡全面、詳盡地評述了孫中山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偉大的革命業績。與造反派誣蔑攻擊孫中山的謾言針鋒相對，她採用大量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歌頌了孫中山的事業與

品質。寫於特殊年代的這篇長文，傾注了她對丈夫的無限敬仰和懷念：

「孫中山一生奮鬥的目標已經實現並且已經超過了。但他的名字和他的精神仍然活在我們心中。我們為他四十年的忘我鬥爭而感到驕傲。他的遺言『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今天聽來仍然是正確的。」¹²⁰

宋慶齡親自動手，幾易其稿才寫成了這篇文章。她對文章的修改、內容的取捨，有過很多考慮。她這樣做，是為捍衛民族的尊嚴和保護民族遺產而鬥爭，更是對一夥野心家的倒行逆施的還擊。其間，不少同志對她有所幫助。會後，她很想邀請所有幫助過自己準備這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宋慶齡會見日中友協理事長宮崎世民和夫人以及日本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訪華團成員。

篇講話的同志們一起吃頓飯，但已不合時宜。那時政治局勢的複雜性，由此可以想見。

「文革」整整十年所發表的有關孫中山的文章中，只有宋慶齡的這篇可以歸於高品質的學術性論文。它之所以能夠衝破姚文元等人對輿論陣地的壟斷，得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與周恩來的支持和關懷是分不開的。周恩來在百忙當中親自修改了這篇文章，將其安排在十一月十三日刊出，還請愛潑斯坦潤色了該文的英文稿。¹²¹

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宋慶齡以筆為武器，寫下了不少著名的聲明、宣言和文章。上述只是其中的一篇。她具有很好的文學素養，也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多產的女才子，一生著述豐厚，文如其人。周恩來曾評價：「宋慶齡的文章說理清晰，語言新穎，是親自動手寫的，這種作風和文風值得學習。」解放初期，郭沫若曾對宋慶齡的文章表示非常欽佩，認為是大家手筆，當代著名作家也不能及。這主要是指文章的思想內容。陳毅認為宋慶齡的文章許多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文獻，從中可以看出中國歷史的發展、革命的思潮和革命力量的消長。他建議宋慶齡把這些文章編輯出版。¹²²宋慶齡嚴肅考慮後，於一九五二年編選出版了文集《為新中國奮鬥》。一九六六年又在該書的基礎上出版了《宋慶齡選集》。

物換星移，一九六六年就這樣在正義與邪惡的反復搏鬥、犬牙交錯的狀態中過去了。但是，新歲到來之際，由於陰謀家、野心家的活動更加猖獗，禍患橫溢，這場「無產階級文化

121 李雲：《三十年代在宋慶齡同志身邊兩年》，載《解放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122 廖夢醒：《我認識的宋慶齡同志》，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三、四日。

大革命」就連親手發動它的人也難以控制了。隨著運動的開展，宋慶齡看到的不是「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進入了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更不是向著「一個沒有人剝削人、沒有民族壓迫、沒有種族歧視的世界而努力」，而是完全走入歧途。她和全國人民一樣，很快由希望轉為失望，對運動給國家和人民事業造成的災難感到深深的憂慮。

宋慶齡通過種種複雜的現象，逐漸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質。在這次公開講話之後五年左右的時間裡，除了作為國家副主席接受一些國家的新任駐華大使遞交的國書，參加國慶招待會和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等禮儀活動外，她很少公開露面。外界既聽不到她的聲音，也見不到她的文章。她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表達過自己的心志：我不願意被人當「擺設」，決不隨波逐流，隨聲附和。她的愛憎是分明的，抉擇是感人的。

在令人壓抑的氛圍中，宋慶齡心情憂鬱，一直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黎沛華和劉一庸離開之後。她就在臥室裡的小圓桌上用飯，很少下樓。一般情況下，幾乎足不出戶。日常也就是種種花、養養草、餵餵鴿子。

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宋慶齡的心都始終與人民在一起，時刻惦念著國家的命運、黎民的苦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她曾先後給中共中央寫過七封信，表達自己對這場「革命」的不理解和反感，乃至產生失望情緒。她還曾幾次希望能像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那樣去視察基層，深入群眾，瞭解人民群眾的意見和要求。然而，當時國家政治生活的混亂和群眾中激烈的派性鬥爭，使她無法實現自己的願望。在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下，她的工作

被迫減少到了最低限度。由於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倒，許多工作癱瘓，以國家副主席的身分接受一些國家新任駐華大使遞呈的國書，接見外賓，成了她主要的、幾乎唯一的國務活動。此外，她能做的，就是給一些因病去世或受折磨致死的國家領導人及著名人士送去花圈，出席追悼會。

閒暇時，一個人靜下來，宋慶齡會把時間消遣在她所愛好的活動上。居室中的那架黑色的老式鋼琴，同她用來溝通與世界的聯繫的打字機一樣，也是她終生的夥伴。雖然沒有在公眾場合演奏過，但幾乎每天晚上她都要彈琴自娛，有時一彈就是幾個小時。她常聽《黃河》交響曲和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將自己的思想感情與樂曲交融。她還時常伏案繪畫，或請親友及他們的子女來北京寓所的湖內游泳，她則安坐在湖邊的樹蔭下安詳地觀看，聊以排憂解煩。

在她的北京寓所，這座清朝的王府花園裡，有山有水，宋慶齡幾乎每天都在花園裡散步。即使因為腿不好常會有失去平衡的時候，她也堅持自己走路，不願別人攙扶。她愛好種花，只要能動就自己親手栽植、花園的花匠站在她的身邊，萬一她站不穩，就順勢扶她一把。每當這時，她都要客氣地說：「我給你添麻煩了。」她每天還要親自去餵食鴿子，喜歡站在那裡仰望鴿子們在空中翱翔……

宋慶齡以這樣的方式來消愁遣悶，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天不結束，國家一天就得不到安寧，她的憂愁也難以完全消散。樹欲靜而風不止，意想不到的干擾還是不斷地向她襲來。

一九六八年初，上海的造反派從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金仲華的住所抄走了大量的檔和信札，其中包括宋慶齡和他的往來信件及底稿數十封。張春橋看到後如獲至寶，他說：金仲華可能是美國特務，「宋慶齡這個人可複雜了」，並親筆批示：「應當整理一份材料報中央、中央文革，並繼續查下去。」按照他的要求整理上報的材料，突出強調了金仲華與宋慶齡「有特殊密切的關係」；「這次抄獲宋慶齡給金仲華的信有七十餘件。除一二件用中文寫的外，其餘都是用英文寫的。經專人帶交的約占半數。『文化大革命』以來，他們的通訊（信）特別多」。材料分析，從這些信件可以看出：第一，金、宋之間往來十分密切；第二，金、宋談話內容，值得研究；第三，「文化大革命」期間往來頻繁，互通京滬「文化大革命」情況。雖然懾於宋慶齡在國內國際的崇高威望，他們沒有敢對她貿然下手，但他們的惡毒用心是顯而易見的。

宋慶齡為了保護自己，也為了保護朋友和同志，不得不採用了新中國成立後她從來沒有採用過的「地下工作」的聯絡辦法。在給朋友和同志的信末，她都會注明「閱後燒掉」的字樣。



宋慶齡畫的畫。

例如，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在給廖夢醒的信中，她就附注了這樣的要求：「另請將我所有的信都銷毀！」¹²³那時她與馬海德夫婦通信較多，他們常常在信中談論對「文革」的看法。他們兩家住得很近，宋慶齡的信都是交由忠誠的保姆或司機送去的。遵照宋慶齡的囑咐，馬海德看完後都將其銷毀了。所以，後來，馬海德的家被查抄時，雖然損失了許多文書資料，但宋慶齡的信一封也沒有讓造反派得到。而金仲華則不然，他沒有按照宋慶齡的要求去做，結果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文化大革命」還給宋慶齡帶來一些其他的困擾。當時，醫院中取消了按摩護士，認為做按摩是「資產階級的奢侈行為」。宋慶齡的背部和膝關節疼痛難忍，只得從上海找來一個身體強壯的阿姨為她按摩。當時宋慶齡要尋覓一個好的保姆也很是困難，因為很難符合公安部門要求的各種條件。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給宋慶齡介紹來的保姆既笨又懶，甚至拒絕給宋慶齡洗衣裳；後來，他們又曾派來一位見習保姆，她是一位警衛員的妻子，一個山東籍的纏足婦女，來後鬧的笑話一籬筐。宋慶齡在一九七三年四月三十日致廖夢醒的信中氣憤地寫道：「他們甚至給我找來了一個『三寸金蓮』，謝頂的山東大娘！但他們說她成分好。難道一個人還得為她的祖先負責！」¹²⁴

是非顛倒的歲月裡，既有人對宋慶齡放明槍進行人身攻擊，又有人對她施暗箭傷害她的

1 2 3 《宋慶齡書信集》（續編），第四百二十二頁。

1 2 4 陳漱渝：《自慰的鎮痛劑——讀〈宋慶齡書信集〉（續編）》，載《新華文摘》二〇〇四年第二十一期。

聲譽。其中，對宋慶齡與孫中山的婚姻關係和個人私生活方面散佈流言蜚語進行誹謗和中傷，就是他們的拙劣伎倆之一。

中傷和誹謗宋慶齡已成為歷史的個人生活問題，只不過是故伎重演。早在一九四八年，宋慶齡面對同樣的誹謗，就坦然地告知誹謗者：「關於我的婚姻，完全沒有什麼可遮遮掩掩的。我丈夫是在有合法結婚自由時才與我結婚的。」；「就我本人來說，我認為只要我與反對黨的工作有聯繫，這種誹謗性的攻擊就會繼續下去，哪怕到我滿頭白髮的時候。」¹²⁵

事實不幸被她言中，「文化大革命」初期，宋慶齡已步入老年，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為了實現其政治陰謀，又搬出了這套撒謊的老把戲，並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跟著起哄、鼓噪。她起初對此不屑一顧。不久，她就警覺到他們是在「重複反動派在孫博士和我的婚姻問題上對我們的造謠誣蔑」。這不僅僅關乎孫中山、宋慶齡的個人形象和聲譽，他們的拙劣手段，是企圖推翻孫中山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以篡改歷史。年邁的宋慶齡只有毫不含糊地奮起而反擊，以此維護自己與孫中山婚姻的真实性與合法性。這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忠誠於孫中山的理想和事業、維護孫中山旗幟的一次重大行動。

除國內有些人散佈謠言以中傷宋慶齡外，國外也有人不負責任地重複反動派在婚姻問題上對孫中山和宋慶齡的造謠誣蔑。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宋慶齡分別致函著名作家韓素音¹²⁶和友人

125 《宋慶齡書信集》（續編），第一百三十九——一百四十頁。

126 韓素音（一九一七——）：英國籍作家，醫生。宋慶齡的朋友。父母親分別是中國人、比利時人。曾到美國、德國、瑞士等二十

麥克唐納，明確指出一些有關孫中山的著作中的錯誤。她說：「在利昂·沙爾曼寫的那本傳記中，我發現她在描述我的婚姻這部分也像其他一些作者那樣犯了相同的錯誤。」她鄭重地聲明：「我是從上海去東京並於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那裡同孫逸仙結婚的婚，這就是說，我們結婚的時間是在他們（按：指孫中山與元配夫人盧慕貞）離婚幾個月之後。我們的婚姻是在東京市登了記的。舉行婚禮之前，我們當著律師的面在結婚書上簽了字。結婚的證書是一式三份，這些證書分別由孫逸仙、我和著名的日本律師和田瑞保存。」她指出：「很久以來，敵人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傳教士都在這個問題上對我進行誹謗。」她特請朋友採取任何「認為合適的辦法把我這個聲明公之於於世人，以正視聽」。

127

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哈里森·E·索爾茲伯里在所著《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一書中也不負責任地引用了那些謠言，重複了別人的這一錯誤。對此，宋慶齡於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特別鄭重地致函孫科的親戚林達光說明：「當她與孫中山結婚時，孫中山的兒子孫科正在美國加利福尼亞，「他父親把離婚和結婚的事都告訴了他」。孫科應「還保留著這歷史性的家庭檔案」。她說：「我實在感到吃驚，像索爾茲伯里這樣一位知名作家怎麼會容許自己去重複反動派在孫博士和我的婚姻上對我們的造謠誣衊。」、「我也感到驚訝，像索爾茲伯里這樣有地位的人在寫到這樣一樁史實時怎麼不先做一番研究。……我想什麼地方都會有這樣的人，他

127 多國講學和遊歷，介紹中國歷史、政治、社會改革、宗教、民族、青年、婦女、知識分子等問題，寫出頗多有關於中國的文章和著作。
《宋慶齡書信集》下冊，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六百八十三——六百八十四頁。

們相信只要摔出去足夠多的污泥，總有幾塊會沾上的！」¹²⁸一週後，宋慶齡又直接致函該書作者，直率地批評其錯誤：「大作《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我已拜讀。請允許我指出一個史實上的錯誤。孫逸仙在我同他於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結婚時，他是自由的。（結婚的年份不是您所說的一九一四年，當時我還在上海。）……反動派和傳教士（他們常常是反對進步的）試圖造謠誣衊我們，但事實總歸是事實。……我丈夫的兒子現住加利福尼亞，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地從他那裡得到有關上述事實的證言。」她敦促索爾茲伯里改正其書中的這一錯誤，同時指出：「你也許可以向你曾諮詢過的那些所謂可靠的參考資料來源發出警告，告訴他們這是一則極為惡劣的不實之詞，他們到處散佈是有罪責的。」¹²⁹不久，索爾茲伯里就改正了錯誤，並把修改後再版的《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寄給宋慶齡，請她指正。

時隔半年，再次傳來了同類性質的誹謗性謊言。宋慶齡不得不繼續予以澄清。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她致函摯友愛潑斯坦夫婦：「請讀一讀附上的剪報。你們作為我的摯友，請告訴我對這些有關我的誹謗性文字，我該怎麼辦。這些有關我的謊言時不時地得以刊佈，使我感到極端的厭惡和憤慨。我沒有錢去請律師來同這個斯坦利·卡爾諾打官司，但我的朋友（按：指他們夫婦）能否寫篇東西來制止這些謊言流傳呢，因為對許多人來說，不斷重複

128 《宋慶齡書信集》下冊，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六百九十六——六百九十八頁。

129 同上，第六百九十九頁。

的謊言會變成事實的。」¹³⁰

宋慶齡性格溫和，寬以待人，說話極少刻薄之辭。但當別有用心者對她和摯愛的孫中山先生結合一事造謠中傷時，她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憤怒：「至於某些人頑固地發出的疑問，我想聲明，現有的任何法律都沒有規定人們結婚要得到那些惡毒的誹謗者的同意。拉丁有諺語曰：世間自有公正的頭腦，所以讓這些狗去叫吧。」¹³¹

為了澄清誹謗者的謊言，不使謬種流毒人間，一九八一年四月至五月間，即將辭世的宋慶齡甚至不顧衰病之軀，強支病體在北京寓所用英文寫下了《我家和孫中山先生的關係》一文。她鄭重地回憶了自己與孫中山先生早年接觸的一些情況，著墨最多之處講的還是她與孫中山的結合，闡述兩人的相識、相知、相愛到結合的過程。她親筆寫下這段往事，希望在有生之年，針對國內外一些誹謗謾言進行澄清，使那些無稽之談者在陽光下現出嘴臉。

宋慶齡與孫中山一起生活的時間只有十年。在孫中山逝世的時候，她還年輕美麗。即使進入中年之後，她依然魅力如昔、風韻不減。但幾十年裡，她堅強地一個人生活著，繼續著孫中山先生的未竟事業。她對孫中山先生的忠貞不渝，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好事者的濫口卻難以封住，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發揮想像力，一次次借此大做文章。

「文革」期間，關於宋慶齡的私生活問題，無中生有的謠傳也不脛而走，四處流傳。他們

130 《宋慶齡書信集》下冊，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七百〇六頁。

131 英文原件上海交通大學檔案館藏。轉引自盛永華主編：《宋慶齡年譜》下冊，第一千六百九十四頁，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

胡說什麼「宋慶齡又結婚了」，「不再是孫中山夫人了」。在那個造謠不但無罪且頗有市場的年代，一張大字報就可以置人於死地，卻不容受害者申辯。宋慶齡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在給愛潑斯坦的信中這樣寫道：「……我想，對那些無端誣衊，我只有閉上眼睛——外面那種敲鑼打鼓的喧鬧聲已經夠叫人心煩意亂了。希望你離得遠，聽不到。」¹³²

宋慶齡自己雖然受到了最高當局的保護，可是她的親友在劫難逃。她二舅倪錫純的長子倪起士被誣為「國際三K黨」，成為專政對象，一度每月只發十五元生活費；全家被趕到一間小屋居住。宋慶齡雖努力接濟他們，寄錢、衣物和藥品，但在那風雨如磐的日子裡，他們的生活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尤其悲慘的是倪錫純的長女倪吉貞的遭遇。她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精通英文，很有教養，宋慶齡非常喜歡這個表妹，見她一直獨身，曾想邀她來做秘書，陪伴自己度過晚年。不料「文革」狂風驟起，不僅破滅了宋慶齡的美好的心願，而且無情地吹折了這根潔身自好



宋慶齡晚年的幾幅照片。

的秀枝。倪吉貞成了「管制分子」，被掃地出門，強制勞動。她不堪凌辱，在一九六八年五月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大好形勢」下，被迫跳樓自殺了。

宋慶齡羞愧、悲憤交加，自覺難見親朋好友，更不好向早已長眠地下的母親交代，因此氣得病了一場。

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會及其所屬單位，儘管在婦幼保健、兒童文化教育和對外宣傳上取得卓越的成績，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卻被「四人幫」誣衊為「修正主義的樣板」，工作人員遭到迫害。十年動亂開始時，中國福利會在上海的工作處於停頓狀態。宋慶齡為接不到他們的工作報告而十分焦急。原來，這些單位的領導當時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宋慶齡於是請上海市副市長金仲華幫助。他像以往一樣認真負責，走訪了這些單位，鼓勵他們繼續工作。可是不久，有人告訴宋慶齡說，金仲華本人也遭到了「四人幫」及其爪牙的殘酷迫害。宋慶齡想設法同他見一面，也沒成功。宋慶齡氣憤地發問：金仲華到底犯了什麼罪？可是沒有得到回答。幾年以後，宋慶齡才知道，金仲華一生中所做的好事都被歪曲、顛倒，成了他的「罪證」。¹³³金仲華終於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以莫須有的「外國間諜」罪被殘酷迫害致死了。宋慶齡對這位「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時期的老戰友、《中國建設》雜誌社第一任社長遭此不測，十分痛心，無比憤慨。

133 參見宋慶齡：《懷念金仲華——〈中國建設〉的創始人之一》，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七年一月七日。

另一種精神上的打擊是一九七六年一月至九月，她所敬重的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對全國人民無比敬愛的周恩來多次發難，宋慶齡非常氣憤。當她知道周恩來生病後，就讓秘書杜述周捕魚慰問。杜秘書等在萬泉河漁場借了圍網，於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和警衛一起在南湖捕到一條二十三斤半重的大胖頭魚。宋慶齡隨即就叫杜秘書把魚直接送到周恩來家裡。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時，她正好在北京，當她參加弔唁活動回家後，一個人靜靜地獨坐著流淚，重重地歎氣，說：「國家少了一個好幫手，一個好幫手呀！」

七月和九月，朱德和毛澤東先後逝世時，宋慶齡正在上海。噩耗傳來，她兩次赴京參加追悼活動，並重重歎著氣，悲痛地說：「唉，國家又去了要緊人。」宋慶齡平時很沉著、冷靜，輕易不動感情，但現在卻常常歎氣流淚，可見她對毛澤東和周恩來、朱德的情誼之深。但是由於在「四人幫」的高壓下，她對他們的悼念之情不能充分表達出來。

宋慶齡由於憂國憂民，心情沉重，再加上隔壁的兩個機關不停地放大喇叭，打派仗，吵得一貫愛好清靜的宋慶齡日夜不得安寧，健康受到嚴重損害。儘管如此，宋慶齡仍然發揚解放前不顧自身處境惡劣，只關心別人安危、幫助戰友解除危難的崇高精神，與陰謀家、野心家周旋，努力保護同志和朋友免遭厄運，少受衝擊。她頂著強大的壓力，為路易·艾黎的革命歷史寫了證明。證明說：「我從一九三〇年起，就認識路易·艾黎。他為中國做了貢獻，

幫助我們保衛國家。」接著她列舉了路易·艾黎從抗日戰爭至解放後為中國革命所做的貢獻。最後結尾說：「我極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樣，是國際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的信徒。」這份很有說服力的證明，在浩劫中解救了路易·艾黎。

宋慶齡對劉少奇子女在「文革」中給予的關懷和照顧，也生動體現了她在逆境中不畏強暴，同情、關懷弱者的高貴品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劉少奇對王光美說：「宋副主席是位偉大的婦女，她堅持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畏強壓，堅持革命，同全家都斷絕了關係，我們應該多給她一些家庭溫暖。」他們知道宋慶齡非常愛孩子，就常讓自己的孩子給她寫信，還寄去圖畫、手工等。宋慶齡曾邀請王光美帶著孩子去她的寓所玩，對孩子們自稱「宋媽媽」。每到耶誕節、新年前夕，劉少奇的孩子們就主動給「宋媽媽」製作賀年片，並給她寫信。宋慶齡很喜歡孩子們的這些禮物，給他們寫充滿感情的覆信，鼓勵他們上進，還贈送每個孩子筆記本、糖果、小點心等禮物。¹³⁴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劉少奇即被以「全國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莫須有罪名受到批判。宋慶齡得訊後表示：對劉少奇這樣的老革命家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呢？義憤之情，溢於言表。¹³⁵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劉少奇全家已處於逆境。出乎他們的意料，他們仍然收到宋慶齡送給幾個孩子的賀年片、日記本和糖果，一切與往年一樣。這是對他們全家受

134 王光美：《永恆的紀念》，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二日。

135 羅叔章：《痛悼敬愛的宋慶齡名譽主席》，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日。

到不公正待遇的無聲抗議，是對受害者最珍貴的同情和支持。劉少奇全家看著那熟悉、剛勁的宋慶齡的筆體和給孩子們的無比親切的「宋媽媽」的簽名，猶如荒漠中飲到了一口甘泉，感到溫暖和慰藉。

一九六七年，劉少奇一家進一步受到林彪、「四人幫」的迫害，弄得妻離子散，天各一方。孩子們也千方百計打聽父母的下落。萬般無奈，他們只好給「宋媽媽」寫信。宋慶齡不怕擔風險，立即把信轉給了毛澤東，同時，又盡她所能，努力保護孩子們的安全，照顧他們的生活，鼓勵他們好好學習。一九七二年，孩子們終於獲准到監牢裡看望母親。王光美見到孩子們的精神面貌很好，知道是宋慶齡在關懷著他們時，心中充滿無限感激之情。她深深感到，「人民是他們的父母，慶齡同志又一次在我們心中成為偉大人民的象徵」。¹³⁶直到一九七六年，宋慶齡還讓身邊工作人員到南長街給住在那裡的劉少奇的孩子轉送物品。

葉恭綽原是前清重臣，繼又成為北洋「交通系」的骨幹，後來迷途知返，信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擁護孫中山統一中國、振興中華的主張。民國元年擔任交通次長時，他曾協助「全國鐵路督辦」孫中山籌畫設立全國鐵路總公司，規劃修建全國鐵路網，被孫中山讚譽「英俊有為」。一九二三年被孫中山聘為大元帥府的財政部長和建設部長。孫中山逝世後，他在中山陵旁修建一座「仰止亭」，表達其矢志忠於三民主義、永遠景仰孫中山的感情。一九四九年，

他更是深明大義，追求光明，冒險從香港返回大陸，參加新政權的建設。但是，這樣一位不斷進步、可敬可佩的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誣衊為「封建餘孽」、「袁世凱和蔣介石的黑幹將」，受到衝擊，陷入困境。宋慶齡得知後義憤填膺，讓秘書到葉家中送去二百元錢，作為對孫中山部屬的撫慰。葉恭綽見到這筆錢後，老淚縱橫地說：「孫夫人的心意我領了，但這錢不能收，因為孫夫人也是靠工資生活，並沒有財產。」葉夫人認為宋慶齡一片誠心，卻之不恭，商量後還是收了下來。

葉恭綽用微微發抖的雙手接過錢，激動地對宋慶齡的秘書說：「孫中山先生是一個腳踏實地的行動者，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是一個意志堅強、不屈不撓的人。我追隨孫中山先生多年，希望死後能埋在仰止亭，在九泉下也能看到中山先生。這個意思，請轉告夫人。」

宋慶齡聽秘書報告後，欣然同意葉的懇求，並給他寫了覆信。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葉恭綽終於離開了這個「不准」他革命的世界，享年八十八歲。可以安慰的是，由於宋慶齡的安排，他的骨灰埋葬在仰止亭，生前夙願得以實現，保全了他不屈服於政治淫威、堅持進步的崇高品質。

金仲華遇難以後，上海福利會及其所屬機構的處境更加惡化。「四人幫」在上海代理人的黑手再次插入，強行要把宋慶齡視為掌上明珠的兒童藝術劇院跟上海人藝、上海青年話劇團合併，成立一個由他們直接控制的「上海話劇團」。宋慶齡得知後，專程回到上海，向兒童藝術劇院表示關懷。消息很快傳遍上海灘。色厲內荏的陰謀家們，在宋慶齡這座大山面前，只

像一杯黃土那般渺小，自知他們的勾當見不得陽光，只得悄悄地撤走「工作組」。兒童藝術劇院再次免遭被「砸爛」的厄運。

中國人民是飽經憂患而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偉大的人民。一九七六年十月，正義終於戰勝邪惡，光明代替黑暗，萬惡的「四人幫」被粉碎。從此，神州大地春風送暖，萬物復蘇，國內形勢開始好轉，新中國的歷史又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宋慶齡不惜老邁，也以無比激動的心情，與全國人民一起慶祝這一歷史性的勝利。在粉碎「四人幫」後第一個國慶日前夕，她寫信給羅叔章表示：「將以無比歡欣的心情慶祝這個節日。」¹³⁷她懷著深情，撰寫了懷念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文章，抒發她對他們的崇敬和懷念之情。

但宋慶齡並沒有停留在歡慶粉碎「四人幫」的勝利上，而是根據自己的認識進行深刻的反思，為人民、為子孫後代總結寶貴的歷史教訓。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她發表的《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戰勝的》一文，就是她反思的成果。在這篇文章中，她總結新中國三時年的



一九七九年攝於北京住所。

歷史，進一步加深對於「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真理的認識。她指出：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過了一條偉大的道路」，「雖然這條道路也是很艱難曲折的，但是，一切野心家、陰謀家都沒有能夠、也不可能戰勝九億人民的堅強意志。而且這些野心家，陰謀家，沒有一個不是在人民的鋼鐵意志面前碰得頭破血流。過去是這樣，今後仍將是這樣」。她滿懷信心地說：「我堅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戰勝的。」¹³⁸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思想路線上清算極「左」的路線，確定了二〇〇〇年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和平統一祖國」的兩個戰略目標。

宋慶齡雖已進入體衰多病的晚年，仍似伏櫪老驥，壯心不已，決心為兩個目標的早日實現貢獻自己的全部餘熱。

宋慶齡對於生死問題，採取的是徹底唯物主義的態度。她雖年逾古稀，卻忘記了身體上的衰老，毫不在意自己的生理年齡，依然不懈地為人民的事業奮鬥和奉獻著。「我對於老之將至毫不擔心。我努力使我的頭腦保持年輕和健全。因為有許多年紀較大的人並不是由於『年老』而減少對人民做出值得稱道的貢獻……只要我能離開醫生的治療，我就要回到我的工作崗位上去。」¹³⁹當八十初度時，她在致友人的信函中表達了這樣的渴望。

一九七九年，已經八十六歲高齡的她，還寫下了豪邁的語句和友人共勉：「不要為不能

138 《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139 愛潑斯坦著、沈蘇儒譯：《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六百三十三頁。

如願感到遺憾。記住，生命的曙光仍在前頭！」

140

三、口頭和書面遺囑

關於自己的身後之事，宋慶齡一九八一年四月在病重期間曾向在旁侍候的沈粹縝及保姆鐘興寶作過囑咐：如果自己有一「什麼問題」，要把她送到上海，埋葬在她父母親和不久前病故的、同她一起生活五十三年的李姐墓旁；李姐和她自己的墓碑的位置應在她父母合葬墓的左右等距，都平放在地上，墳同大小。¹⁴¹這是她對李姐遺體火化及骨灰安葬的囑咐，同時也是為自己身後之事的安排。

平日裡，李燕娥除精心照料宋慶齡的生活之外，還替她傳送信件和文件，陪她外出參加一些重要政治活動，做好保衛工作，她五十餘年如一日地保護和支持著宋慶齡的革命活動，並以此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宋慶齡一直把她視為家中的一員。李姐（有時稱「李媽」）病重之際，宋慶齡很傷心。她把自己的心緒向友人透露：「這些天，我心裡很亂，幹什麼都沒有心思。李媽忠心耿耿，一直對我很好，我們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從來沒有發生過齟齬。我擔心她不久人世！……我心亂如麻……」¹⁴²宋慶齡專門打電報從美國買來藥，說：「我們為她搞到了

140 《宋慶齡書信集》下冊，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八百四十四頁。

141 《杜述周回憶材料》，未刊。

142 《宋慶齡書信集》（續編）第六百五十二、六百五十三頁，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

最好的針劑。」；「只要打針還能維持她的生命，我就要讓她活下去，五十多年來她一直是我的一位忠實益友。我要不惜一切代價救她。」¹⁴³但是這並沒有減輕李媽的痛苦。「看到她慢慢地死去，疼痛煎熬著她——卻沒有任何藥物能幫助她，真是難過！」結果，李姐去世了。

她的去世，使宋慶齡極為悲痛。當得知她在醫院病故的消息時，宋慶齡頓時淚眼迷蒙，長歎一聲。為紀念這位陪伴自己半個世紀的忠實朋友和同志，宋慶齡贈送了花圈，二月十三日在關於李媽喪事安排的檔上作了如下批示：「我一直答應讓李姐的骨灰葬在我父母的墳的邊頭，要立她的碑。我以後也要埋在那裡。記得我家（在）那裡有八穴地。」¹⁴⁴宋慶齡指著宋氏墓地的圖紙對沈粹縝說，李燕娥的骨灰葬在左邊，平行的右邊是她自己的。因為是小輩，要比她父時的墓穴低。二月十七日，李媽的骨灰遷返上海，宋慶齡要沈粹縝陪她一起去看看。她用手親切地撫摸著骨灰盒，並多次把臉貼在上面，淚水點點滴滴落下來。她在為李媽豎立的石碑上刻上了「李燕娥女士之墓宋慶齡立」的字樣。

宋慶齡把李燕娥安葬在宋氏墓地的緣由，據廖承志講，宋慶齡此舉是以導師馬克思為榜樣而做的。當年，馬克思把一生照顧他們家庭生活起居的阿姨葬在馬克思墓地（位於英國倫敦海德公園），與他的家人長眠在一起。宋慶齡的一生都心系著底層勞動人民，死後，也決定

143 同上書，第六百六十七頁，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

144 《紀念宋慶齡同志》畫冊，圖三四五。

以這樣的象徵形式與勞動人民永遠在一起。145

人們沒有想到的是，當宋慶齡為李燕娥安排喪事時，她的慢性淋巴白血病，已經嚴重損害了她的健康。

從五月十五日到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不斷向全國人民發佈關於宋慶齡病情的公告。她的病情在繼續惡化，體溫持續在攝氏三十九度以上，胃腸道出血，血壓繼續下降，醫務人員在全力搶救。在此期間，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斷前往看望。全國各地發來數百封慰問函電。大家衷心祝願她恢復健康。有的還寄來了藥方或治療藥物。他們當中有工人、農民、科學家、醫務人員和少年兒童。

五月二十日這一天，廖承志又去探望了宋慶齡。他們進行了足足二十分鐘的談話。這也是宋慶齡生前最後的一次談話。她吃力地對廖承志說：「你們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謝。」她喘了幾口氣後又說：「如果我有什麼問題的話……」廖承志不忍心看她痛苦地勉強說話，忙接過話茬兒：「叔婆（按：這是他與廖夢醒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以來對宋慶齡的尊稱專用語）請放心，我們將照您的吩咐去做的。一切照您的意思去做。」她點頭表示滿意。廖承志寬慰她：「叔婆，請您不要再講話了。請您好好休養。我明天再來看您。」她微笑著艱難地喃喃道：「明天……明天……」¹⁴⁶她可能還有許多話要講，她對「明天」依然抱著無限的期望。到了「明天」，

145 李家熾：《斯人已逝唯情長存——記宋慶齡晚年及逝世有關事宜》，載《孫中山宋慶齡研究動態》二〇〇五年第六期。

146 廖承志：《我的吊唁》，載《宋慶齡紀念集》第六十三、六十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廖承志又去了，但她卻從此處於半昏睡狀態，再也沒有能力開口講話了。

宋慶齡逝世後沒有要求以夫人的身分安葬在中山陵。她不願在莊嚴肅穆的中山陵分享孫中山先生的崇高榮譽。對此，廖承志曾這樣闡釋：「宋慶齡同志的腦中，永遠不曾有過『特殊』兩個字。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從未想過身後作什麼特殊安排。台港有些人說，她可能埋葬在南京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過這些。中山陵的建造構思，她不曾參與過半句，也不願中山陵因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現在為此而花費國家的人力錢財。」而對於上海，宋慶齡對沈粹縝說，上海是她的出生地，是她從事革命活動和居住時間最久的地方，她在那裡結交過許多革命者和進步朋友。當年她將大批醫藥物資送往解放區支援人民軍隊，也是從上海運出的。解放後，她在這裡會見過許多國際友人。上海有孫中山的故居。她的父母都葬在上海。她熱愛上海，一再囑咐在去世後一定要把她的骨灰葬在上海萬國公墓宋氏墓地她父母的墓旁。

這一偉大人物極其平凡的遺囑，顯示了她的高尚品德。

宋慶齡的這一決定，還體現了她的一種婦女解放與獨立的思想觀念。解放前，她在領導婦女運動時曾提出過一個「新的、更廣闊的遠景」：「有一天婦女將不再以偉大的妻子與昵友的身分，而憑自己作為公民的權利參加國家的活動。」¹⁴⁷這實際上也是她個人的心願。她早年不顧世俗的壓力和家庭反對堅決與孫中山結合，並在孫中山逝世後始終懷念與紀念他，那

是出於對丈夫的深厚感情和革命的忠貞；她一貫高攀孫中山的旗幟，殫精竭慮、鞠躬盡瘁，為實現孫中山的未竟理想而奮鬥，人們也因她是「孫夫人」而更加尊敬她。而在她個人，從來沒有想從「孫中山妻子」的身分中取得一點利益，相反，她為不玷污這個身分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現在是真正實現她不從屬於「偉人」這一樸素願望的時候了。

宋慶齡除了口頭遺囑外，尚留有書面遺囑。她的書面遺囑的發現和處理情況是這樣的：

在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宋慶齡移靈後，廖承志、汪志敏、沈粹鎮、杜述周在宋宅檢查宋的遺物時。在她臥室的抽屜內找到三份遺囑和三本日記。¹⁴⁸先後找到的五份遺囑，處理身後之事。這五份因修改原因寫在不同時期的遺囑，有用英文寫的，也有用中文寫的。

鄧穎超在同年六月十日起草《執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辦法（草案）》（以下簡稱《辦法》），報送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批示。《辦法》共有六點內容：第一，明確由有關同志組成臨時小組；第二，臨時小組由高登榜、汪志敏、李家熾、杜述周、陳翠珍、童小鵬、廖承志、鄧穎超等八人組成，由高登榜召集會議；第三，小組的任務是「只做原則的確定，具體處理，由北京、上海兩地有關的機關同志執行」；第四，遺囑凡贈款贈物，除應交由有關機關執行外，均照遺囑執行，遺囑只告接收的人員閱看原件有關部分；第五，鄧廣殷（按：即廖承志的表兄鄧文釗之子）已有聲明，所贈書籍不接受，交公處理；第六，北京、上海住宅原則保留，

建議由中組部、統戰部、文物機關議處後，分別報中央和上海黨、政機關批定。胡耀邦當天即批示「同意」。

六月十四日，中央組織部部長宋任窮在《辦法》上批示：我完全同意。當天上午十時三十分，在中南海中央辦公廳會議室，由高登榜召開八人臨時小組第一次會議，布置宋慶齡遺囑的執行工作。小組成員除鄧穎超因去中央黨校講課未出席外，全部到會。

會上傳達了鄧穎超指示：北京的住宅作為故居以及部分作為少年科技館用，上海住宅作為故居用。此項工作分別由汪志敏、李家熾執行。並要求在宋慶齡逝世一周年時出版文集。

在這次會上傳閱了宋慶齡的前四份遺囑，但最後一份除外。宋慶齡把這最後一份遺囑鎖在自己的臥室裡，鑰匙交給了她深為信任的保姆鐘興寶保管。宋慶齡逝世後，鐘興寶就把鑰匙交給了中央派來處理相關事務的人員。所見到的宋慶齡的一份遺囑中說：「我媽媽送給我的黃金飾品是不能分的，是紀念品。」幾份遺囑大致有以下內容：一是說北京住宅的書籍全部贈給鄧廣殷；二是講某張國畫或某件衣服、銀器、餐具送給誰。最後叮囑贈錢的問題，受贈的共十人，多少不一樣，最少的五百元，最多的一人是一萬元。受贈錢人，主要是上海、北京寓所在宋慶齡身邊工作的同志，包括已故警衛員隋學芳的兩個女兒隋永清和隋永潔。當時，廖承志強調，遺囑執行以最後一份為準，如前後有矛盾，可以把前面的作為參考。

之後，六月三十日，八人臨時小組召開第二次會議。會上，汪志敏彙報北京宋慶齡住宅的清理情況，傳達了中央已經批准北京、上海兩處住宅作宋慶齡故居，上海故居於一九八一

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時對外開放。到八月下旬，八人臨時小組又召開第三次會議，由李家熾彙報了上海宋慶齡故居的清理情況。

八人臨時小組成員李家熾認為：「宋慶齡的遺囑，寫得很平靜，很理智，從政治上，她一直執行三民主義路線，同時接受共產黨的正確主張，一心一意把國家民族搞好，對黨中央是擁護的。當然，宋慶齡也有對『文革』的不滿。」；「宋慶齡最後一份遺囑，我覺得不會涉及什麼政治。她的品格非常高尚，沒有對自己有所要求，只是對她母親給她的禮物認為是紀念品，不能分。」¹⁴⁹。

四、遺愛長留人間

多年以來，宋慶齡時常受到病痛的折磨。早在一九七一年二月間，她就在寫給廖夢醒的信中表示自己希望不再繼續擔任行政職務。但是實際上，她還在繼續擔任著國家重要的領導職務，繼續為國家工作著。不斷加重的病痛，考驗著她的意志與毅力。

一九八〇年下半年是一個轉捩點。從那時起，宋慶齡經常發高燒、有時臥病不起。但她還是憑著堅強的毅力，在病榻上操持一些非她親自動手不可的事情。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六日，經專家會診，確診她患了白血病。

五月，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校長霍華德·佩奇博士來華，代表該大學授予宋慶齡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證書。這時宋慶齡的病情已相當嚴重，但為了給中、加兩國人民的友誼獻出最後一份力量，她決定親自出席這次授證活動。她進行認真的準備，特意致函陳翰笙商量授證儀式上的答辭，還請北京醫院的部分醫護工作人員採取特殊措施，穩定了她的病情。

八日下午，授證儀式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穿著大禮服的霍華德·佩奇校長首先致詞，稱頌宋慶齡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社會公僕和社會領導人之一」；由於她「毫不動搖地從事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事業，因而贏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尊敬」。150

宋慶齡身披榮譽博士的禮服，以驚人的毅力，用英語堅持發表了近二十分鐘的講話。她說：「我為接受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博士學位感到榮幸。我接受這一學位，不是為了我個人，而是把它看作是你們對中國人民的崇敬和友誼的象徵。」；「同時，我也是把它看作是把中、加兩國人民連結在一起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誼的象徵。」151

授證儀式圓滿結束後，宋慶齡很感激身邊的醫護人員，決定趁自己有生之日，舉辦一次宴會，酬謝他們。五月十二日，三四十名醫護人員來到宋慶齡家中參加這次意義深長的宴會。席盡人散時，她欣慰地說：「這一件事，我總算稱心了。」

宋慶齡還有一個未了的心願，就是加入中國共產黨。

150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九日。

151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九日。

宋慶齡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經歷了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三個歷史時期，經受了整整六十年血與火、勝利與曲折的嚴峻考驗。她與共產黨的合作，始終如一，真正是牢不可破。她始終把共產黨視為孫中山革命理想和革命事業最忠誠的繼承者和領導者，並且願為共產黨的最高理想共產主義而奮鬥。因此，她早就嚮往加入共產黨。

一九五七年四月，在上海寓所，宋慶齡會見劉少奇、王光美夫婦時，正式向劉少奇提出：「我希望參加共產黨！」劉少奇非常高興，但慎重表示：「這是一件大事，我將轉報黨中央和毛主席。」¹⁵²

宋慶齡在幾十年革命鬥爭的考驗中，已完全證明她早已成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她從



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宋慶齡接受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授予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一九一三年大學畢業投身革命起，半個多世紀來，她與一切反動勢力進行了毫不妥協的鬥爭和最徹底的決裂。在那個年代，像她這樣的愛國主義者，要完成到共產主義者的轉變，須與封建帝制、軍閥的反動統治、國民黨右派、蔣介石反動政權和這一切的總後台帝國主義五種反動勢力徹底決裂，並與主張在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劃清界限。所有這一切，宋慶齡都毫不含糊地做到了。而且，她一貫擁護並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同黨的組織保持最密切的關係，用共產黨員的條件嚴格要求自己。所以，她早已具備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條件。正如鄧穎超在給她的獻詞中所說：「你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處在那樣的家庭包圍中，又長期在蛻變的國民黨的敵視、威脅下，能夠奮勇當先，進行單槍匹馬的戰鬥而堅持不懈，這種堅韌不拔、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貴品質，不愧為人中之傑、女中之傑、偉大的革命戰士。你比荷花更皎潔，比青松更堅貞。周恩來同志曾稱你為『國之瑰寶』，你是當之無愧的。」¹⁵³

劉少奇也說過：「歷史關鍵時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們黨，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貢獻甚至超過我們黨的一些負責同志。」¹⁵⁴

這樣的人加入共產黨，不僅是宋慶齡個人的光榮，也是黨的光榮。

但是，入黨本身並不是目的，入黨是為了革命。像宋慶齡這樣有特殊地位的人物，更要從革命的大局出發來處理組織上入黨的問題。在宋慶齡正式提出入黨要求後不久，劉少奇和

153 鄧穎超：《向宋慶齡同志致崇高的敬禮！》，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154 轉引自王光美：《永恆的紀念》，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二日。

周恩來到上海去看望宋慶齡。劉少奇懇切地對宋慶齡說：「黨中央認真地討論了你的入黨要求，從現在的情況看，你暫時留在黨外對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雖然沒有入黨，我們黨的一切大事，我們都隨時告訴你，你都可以參與。」宋慶齡點了點頭表示理解，尊重黨的意見，暫時留在黨外。當時，她的心情很不平靜，眼中含著淚花，表現了一位偉大共產主義戰士對黨深沉的情感和博大的胸懷。

事實的確如此，宋慶齡以同黨親密合作的非黨人士身分工作，在許多方面的確起到了共產黨員所不能起的作用。中共中央也言必信，行必果，雖然沒有從組織上吸收她入黨，但一直把她作為黨的領導者看待。一九五六年邀請她列席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一九五七年她參加中國代表團出席莫斯科各國共產黨會議，都是對她最大的信任。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黨中央決定專門送中共中央檔和外交方面的檔給她看，她完全按照黨的保守則親自拆封和保管，看畢又親自加封退回。除請她參加重要會議外，有重大事情常由周恩來、彭真、鄧穎超等當面通知並徵求她的意見。有些問題則由齊燕銘或徐冰和童小鵬等，去她的寓所專門報告請示。不論什麼問題，她都是以對黨負責的態度處理，只要是黨的決定，總是無條件地執行。¹⁵⁵「文化大革命」之後，她對黨沒有怨氣，更沒有不滿，一切聽從黨的安排，絲毫沒有動搖參加黨的堅定的宿願。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四日晚，宋慶齡的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經多方治療無效而惡化，突發寒戰高熱，體溫達四十點二攝氏度，伴有嚴重心力衰竭。經搶救後，第二天早晨體溫下降，神志清醒，她最後一次向去看望她的王光美、彭真和鄧穎超提出入黨要求。鄧穎超等人當即表示熱烈歡迎她加入共產黨，並立即報告中共中央。

十五日上午十點半，宋慶齡的入黨要求直接報告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下午，鄧小平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一致通過接收宋慶齡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同時建議授予她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的榮譽稱號。十六日上午，鄧小平看望宋慶齡，祝賀她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她的夙願。她望著鄧小平，微笑著，點點頭。下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剛結束，人大正副委員長彭真、廖承志就驅車前往宋慶齡的住宅，把人大常委會授予她國家名譽主席榮譽稱號的決定告訴她，並表示祝賀。

宋慶齡加入中國共產黨，榮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寫下了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後一頁。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二十時十八分，一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宋慶齡逝世後沒有要求以夫人的身分安葬在中山陵。在宋慶齡看來，「紫金山是只為真心偉大的人物服務的」。她不願在莊嚴肅穆的中山陵分享孫中山先生的崇高榮譽。

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三日，中國共產黨中央、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為宋慶齡舉行了隆重的國葬儀式。

魂歸故土是宋慶齡的心願。六月四日，宋慶齡的骨灰由鄧穎超、烏蘭夫、廖承志、陳慕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五日，新華社發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宋慶齡副委員長病情的第一號公告和中共中央關於接收宋慶齡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的決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予宋慶齡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榮譽稱號的決定。

華等護送，由專機從北京移送上海。當日，上海幾十萬人民群眾在上海萬國公墓舉行了隆重的國葬典禮，骨灰安葬宋氏墓地（今宋慶齡陵園）。墓穴與保姆李燕娥並行，並一般大小，置於其父母墓地下方。素淨的墓蓋上鐫刻著：

一八九三年——一九八一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同志之墓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立

墓的周圍放滿了宋慶齡生前喜歡的黃色香石竹花。隨後，在墓前又塑立了一尊漢白玉的宋慶齡坐像，背景有高大長青的松柏襯托；還修了墓碑，上面有鄧小平的題詞和介紹宋慶齡生平的碑文。

在宋慶齡的墓地上，常年不斷，日復一日，有世界各地的敬仰者獻送鮮花、花籃和花圈。

為讓遺愛長留人間，人們運用各種形式紀念這位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其中，以宋慶齡姓名命名的基金會成立，是最為引人矚目的紀念形成。早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回國參加葬禮的宋慶齡親屬孫穗英、林達文、孫穗華、張家恭、戴成功、林達光、陳恕、陳志昆、黃壽珍、陳燕等聯名發表聲明，決定設立宋慶齡基金會。聲明認為宋慶齡的逝世，「對中國和全世界都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她在世界各地所受到的廣泛愛戴和尊敬使我們深受感動」。聲明



宋慶齡的國葬儀式。

表示為了表達我們以及宋慶齡所有朋友對她的愛戴，我們以她的親屬的名義在這裡宣佈：「我們準備設立宋慶齡基金，為宋慶齡生前最關心的青年和少年兒童的文化教育事業服務。」¹⁵⁶ 這個基金會首先在北美創立，並將依據國際合作的努力精神促進這項事業。

宋慶齡的親屬在醞釀這個基金會時，就徵求廖承志的意見。廖當即表示支援，並提議該組織除募捐基金發展婦幼保健和兒童文化福利事業之外，同時要做加強大陸同胞與廣大海外華僑、港澳同胞的聯絡工作，加強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友好工作。

經過一段時期的籌備。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國內也正式成立「紀念宋慶齡國家名譽主席兒童科學公園基金會」（簡稱宋慶



上海萬國公墓中的宋氏墓地。右側是宋慶齡名譽主席墓。

齡基金會、現名中國宋慶齡基金會），鄧小平為名譽主席，康克清任主席，廖承志為顧問，副主席是榮毅仁、榮高棠、高登榜、吳全衡，理事七十五人，其中除參與發起基金會的宋慶齡親屬之外，有許多著名的領導人和社會活動家，如馬海德、王安娜、丁玲、詹姆士·貝特蘭、巴蘇、王炳南、史良、白楊、米勒、許德珩、沈其震、沈粹鎮、邱茉莉、陳翰笙、羅叔章、屈武、趙朴初、洛伊斯·惠勒·斯諾、耿麗淑、格蘭尼奇、康克清、海倫·羅森、愛潑斯坦、路易·艾黎、廖夢醒等。這充分體現了以宋慶齡名字命名的這個人民團體和慈善公益機構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基金會理事會每屆任期五年，現為第六屆，主席為胡啟立。基金會辦公地點先設在北京後海的宋慶齡故居，現在北京市西城區裕民東路五號瑞得大廈。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作為宋慶齡事業的繼承者，在成立之後的三十年裡，根據章程規定的



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國旗於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日下半旗，對宋慶齡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宗旨、任務和職責，堅持人民團體和慈善公益機構的屬性，堅持服務大局，服務社會，服務青少年的工作方針，在海內外友好組織和熱心人士支援和幫助下，在國際友好、兩岸交流、扶貧助教、科學普及、文學藝術、體育衛生等諸多領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贏得了良好的聲譽。此外，基金會還專門建立了宋慶齡研究中心和宋慶齡故居文物庫，從事孫中山、宋慶齡的學術研究及宣傳以及有關文物、檔案資料的搜集、整理出版與交流等諸項活動。

在國外，除美國外，加拿大、日本、義大利、菲律賓的友好人士也都先後成立了宋慶齡基金會的組織。這些組織均獨立募集資金，獨立開展活動，與中國宋慶齡基金會是兄弟組織的關係。在國內，上海、河南、陝西、廣東等省市和香港、澳門，也先後成立了宋慶齡基金會，積極開始有關工作。由於宋慶齡基金會無相互隸屬的關係，各國、各地區此類機構的名稱也不盡相同。

宋慶齡逝世後，她在上海、北京兩處的寓所，按她生前的布置辟為「宋慶齡故居」，一九八一年十月和一九八二年五月先後正式開放，供人們瞻仰。北京故居內原來被宋慶齡用於會見和宴請國際友人的大客廳和大餐廳，辟為永久性的宋慶齡生平事蹟展覽（後移至新建的文物庫），展出她的生平歷史照片數百張、文物資料三百多件，詳細生動地介紹宋慶齡一生的坎坷的道路和光輝的戰鬥歷程，表現了她的崇高思想和優秀品質，以及她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傑出貢獻。

這些故居和展覽，成為對人們進行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的重要陣地。少

年兒童經常集體來此過隊日，聆受宋慶齡的遺教，向宋奶奶保證刻苦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立志做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堅強接班人，為創造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超過前人的巨大貢獻」。

宋慶齡永垂不朽，遺愛長留人間。

我們今天紀念過去，

但也展望將來，

我們今天正在建設著明天，

為了所有的人民。 157

——宋慶齡



。 777 。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第三節 晚霞滿天垂青史